



OUT OF THE SOVIET UNION
SINO-SOVIET RELATIONSHIP AND ITS IMPACTS
ON CHINA'S DEVELOPMENT

走出苏联

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孔寒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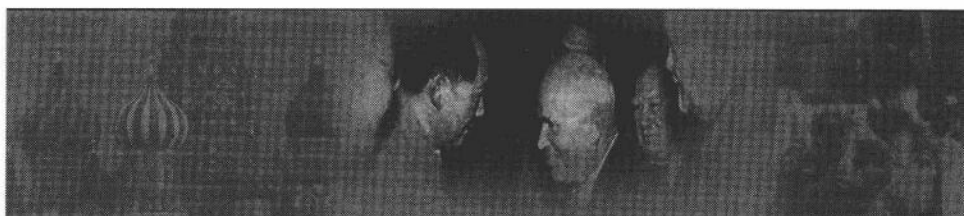
新 华 出 版 社

OUT OF THE SOVIET UNION
SINO-SOVIET RELATIONSHIP AND ITS IMPACTS
ON CHINA'S DEVELOPMENT

走出苏联

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孔寒冰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出苏联：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 孔寒冰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8

ISBN 978-7-5011-9700-2

I. ①走… II. ①孔… III. ①中苏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IV. ①D829.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1001 号

走出苏联：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作 者：孔寒冰

责任编辑：张 程

封面设计：李尘工作室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北京新魏印刷厂

开 本：170mm × 240mm 1/16

印 张：29.25

字 数：400 千字

版 次：2011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2011 年 9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9700-2

定 价：49.80 元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序

北京大学教授

张汉清

20 世纪中苏关系的发展与演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急剧变化与冷战态势不断升温的产物，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起伏曲折发展的结果。它涉及国际关系的变化、中苏两国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与现实政治经济利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和对社会主义的逐步认识，因而短短 40 年的中苏关系确实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重大问题。研究这一课题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所以引起全世界学者的广泛关注。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孔寒冰博士的新著《走出苏联》，就是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新探索。该书从新中国诞生与社会主义苏联结盟到苏联解体与中俄关系的开始，共分 12 章，按历史发展的进程，全面地剖析和阐述了 40 年来中苏关系建立、发展、起伏、曲折演变的历史轨迹，总结了背后的各方面原因和经验教训。这是苏东剧变后中国学者研究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的新成果。

研究中苏关系问题，既要思想解放，不受过去的旧观点与旧框框的束缚，要站在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认识的新水平之上；又要充分尊重历史，尽量掌握陆续公布的档案资料和相继发表的新研究成果，从当时两国的客观实际出发，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作出较为正确的结论。孔寒冰教授就是本着这种认识和方法从事此项研究的，因而写出了这本比较有分量的著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党和人民对苏共、苏联和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兴高采烈、分歧滋生、矛盾激化、公开论战、关系恶化、互成仇敌的起伏、曲折和痛苦的历程。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每个阶段的演变，都在直接影响中国社会的发

展和人民群众情感的变化。当 1949 年建立新中国时，国内外的险恶环境迫使中国党和人民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同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苏联携手结盟才能巩固新中国。因而中国全党和全民一致拥护毛主席提出的“一边倒”的对外方针，在国内大力推行向苏联学习的指导原则，全国几乎一切皆以苏为师。如在 1952 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对旧中国的教育进行改革实行院系调整时，不顾中国的实际和原有的基础，完全照搬苏联高教模式，产生不少后遗症。

那时候，在全国各事业部门、各大国营企业和军事单位，都安排有苏联专家当顾问指导工作。据苏联外交部长谢皮洛夫 1957 年 1 月 4 日在向苏共中央的请示信中披露：“目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部门工作着 2739 名苏联非军人专家，其中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顾问和专家 403 名，经济领域的顾问 123 名，提供技术援助的专家 2213 名。除此之外，在中国工作的还有 374 名军事顾问和专家。”¹ 这大批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确实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中国政府也非常重视苏联专家的接待工作和发挥他们的作用问题。周恩来总理亲自抓此项工作。政务院还成立了专家招待事务管理局，专门负责苏联专家的接待工作。中国政府在当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对苏联专家在华期间的工资待遇、节假日休息、外出旅游、生活安排都作出了具体、优厚的规定，体现了中国对苏联专家的重视、关心和爱护。有苏联专家工作的中国各部门，都严格遵照党和政府的各项具体政策，努力与苏联专家搞好关系，竭力为他们顺利开展工作创造条件。北京大学也是当时接受苏联专家的单位之一，校部和各系均派有苏联专家。我所在的马列主义教研室就有三位苏联专家先后执教，从 1953 年到 1956 年，我曾与来自莫斯科大学的列杜诺夫斯基、巴特里凯也夫教授共事，协助他们开展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当时，从学校到教研室，各级领导都要求我们一定要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特别注意礼仪问题。每次同专家接触，衣着要整洁，要刮胡子；专家讲课时，教师、学生都要准时到齐，不得缺席，不仅要做到课堂秩序井然，而且要虚心听取专家的意见。我们同苏联专家相处关系融洽，真有同志加兄弟的情谊，临别时颇感依依惜别之情。

1953 年斯大林逝世的讣告广播后，如晴天霹雳，许多人痛哭不已，全国顿

1 《中共党史资料》（第 82 辑），第 192 页。

时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内部传达之后，大部分同志一时都接受不了。但是，中国党从维护中苏友好同盟的立场出发，当时严禁不利于苏联的言行在公开场合暴露传播。以致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不少对抗战末期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的不轨行为表示不满、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竟被错划成右派分子，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反修斗争开展后，广大党员从不理解到理解，很快接受毛泽东主席关于反修防修的观点，逐步对苏共的观点产生了怀疑和反对。中苏关系公开恶化，中国人民在感情上虽不无遗憾，但在行动上还是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一致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对苏联的恶感剧增。对于20世纪末发生的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中国人民更是倍感震惊和惋惜！我们希望苏联的悲剧不再重演，世界社会主义将走出低谷，重新复兴！

上面所说的这些就是一名普通的中共党员对苏联兴衰和中苏关系曲折发展的感情历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应当承认，40多年的中苏关系演变，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远的，对中国老一代人的情感影响是复杂的、深刻的。要深入准确地弄清中苏关系变化起伏的种种成因及其影响，需要进行长期深入的研究，解决许多重大问题。如：如何认识中苏两国不同的人文、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如何结合当代实际情况正确理解和应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如何构建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模式？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关系？如何正确认识处理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如此等等。对于这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和认识，20年来虽有很大的进展，但限于人们的认识和研究水平以及历史资料的不足，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只能是初步的，很难一锤定音，作出最终结论，尚待有识之士和后来者继续深入探讨，矢志不断前进。希望孔寒冰教授坚持这个研究阵地，在已获得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勤奋耕耘，与时俱进，作出新成绩，贡献新成就。

导 言

—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不过，即便是这句流传已久的古训，若作为真理，也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面镜子本身必须是平整的。如果凸凹不平，那它就成了一面哈哈镜。在它面前，歪曲的必定是照镜子者自己。胖子一照就成了瘦子，瘦子一照就成了胖子。于是，胖子忙不迭地大吃特吃来增重，瘦子则慌慌张张地不吃不喝来减肥，其结果就不言而喻了。

20 世纪后半期的中苏关系差不多就是这样一面哈哈镜。

从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91 年 12 月苏联解体，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非同一般的大喜大悲的关系整整持续了 43 年。¹

所谓大喜，是指两国关系刚一确立时定位极高，好得至少在表面上几乎已经无可复加。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28 周年而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专门论证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要全方位地站在苏联一边，即所谓的“一边倒”政策。他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所以，

¹ 俄罗斯著名学者、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把 1949—1979 年的中苏关系史以 1960 年为界分成两段，前一段为“不朽友谊的 10 年”，后一段为“敌对的 20 年”，这也反映出了中苏关系大喜大悲的特点。见 Roy Medvedev, *China and the Super Powers*, Basil Blackwell Ltd, 1986, pp. 23, 35。

“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²此后不久，7月27日斯大林在欢迎秘密访问莫斯科的刘少奇的宴会上也动情地讲：“我们（中、苏）两兄弟之间的友好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在世，我们两国人民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仍然应该是团结的。团结就是力量！我们之间的团结，是与世界革命和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³正是彼此认做兄弟当成一家人，新中国刚刚建立，毛泽东就不远万里亲赴莫斯科，将他认为最能体现兄弟之情的大黄豆芽、白菜、萝卜、大葱和梨等中国北方的土特产作为斯大林70岁诞辰的贺礼。⁴也是在这次访问中，《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诞生了，两国之间的“蜜月”关系开始了，并且一直持续到50年代中期。

所谓大悲，则是指50年代中期以后，先是中苏两党就一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理论问题发生分歧，后是中苏两国关系不断恶化并导致双方兵戎相见。中国党认为：1956年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走向修正主义的第一步，因为在那次大会上，苏共领导借口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提出所谓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错误。此后到1960年4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已经系统化了。⁵苏联党则认为：“如果说民族主义分子从前把自己的观点伪装起来，并不得不按中国革命运动的历史任务行事的话，那么中国人民在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帮助下在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后，中共内部的民族主义分子就决定公开实现他们的大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观点。”⁶分歧进一步发展便波及了国家关系，苏联中断与中国的一切经济合作项目，接着两国边境接连发生小规模冲突，最后双方军队1969年在珍宝岛交火，中苏关系也随之到了最低点。两国在经济上毫不往来，在政治上相互攻击，在军事上重兵对峙，在外交上各自为

2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1473页。

3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11页。

4 毛泽东：《中央关于为斯大林送寿礼给山东分局的电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第172页。

5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载《人民日报》，1964年9月6日。

6 [苏]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合著：《苏中关系1945—198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中文版，第127页。

政，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 80 年代中期。

无论是大喜还是大悲都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地反映相应时期中苏关系的现实。前者掩盖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起作用的两国、两党的历史恩怨以及两大民族不同的政治文化和民族心理；后者则是双方老账新账明白账糊涂账一起算，文攻武卫互不留余地。其实，综合已有的和新公布的历史资料和历史档案不难看出，即使在“蜜月”时期，中苏关系里也潜伏着非常多非常大的危机。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指出了这一点。中国学者杨奎松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为背景，探讨了中苏之间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⁷ 国外学者哈罗德·C.辛顿在探讨中苏争论的起源时也说：在中苏关系发展中，民族政治文化传统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⁸ 唐纳德·S.扎果里亚认为：中苏两党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的高低，两党在革命经验上的多少，两国政治环境上的不同，两国经济发展、军事力量以及各自利益上的差别等等，是造成中苏关系危机的主要因素；⁹ 1989 年 5 月 16 日邓小平对来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语重心长地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¹⁰ 造成中苏关系的现状与现实严重背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探讨这些原因也是本书的重点之一，在这儿就不多论及了。但有一点必须指出，那就是这样的中苏关系是严重扭曲了的，因而对中国和苏联的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非同小可的负面影响。

就中国而言，在几十年与苏联的交往过程中，中国党一直把苏联当做一面镜子，原意是想校正自己，走正道或不走歪道。可是，由于不恰当甚至反向地总结了苏联党和国家的经验教训，中苏关系就成了哈哈镜，并且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7 杨奎松：《中苏之间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为背景》，载章百家等主编：《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8—143 页。

8 Harold C.Hinton, *The Sino-Soviet Confronta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Crane, Russak and Company, Inc, New York, 1976, p.3.

9 Donald S. Zagoria: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956—1961*,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15—20.

10 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91 页。

一方面，在关系极好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足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¹¹ 结果基本上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军事体制、文化体制、意识形态体制等并不完全适合或完全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这不仅严重地制约了中国社会发展，而且还带来了许许多多体制上的弊端。美国学者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在总结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时说了这样一句话：“社会主义 70 年尝试的最大教训就在于它们放弃了探索其他的道路。”¹² 这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来说，也差不多有同样的教训。苏联模式的许多弊端，如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农轻重比例失调、严重的个人迷信以及大量的冤假错案等无一例外地在中国重演。也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邓小平特别强调要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如今，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成为中国向前发展的一面旗帜，不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吗？

另一方面，在关系极坏的时候，在中国，苏联党和国家都成了不可救药的“修正主义”。1962 年秋在北戴河中共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赫鲁晓夫在苏联搞的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上是反革命。因此，中国党要搞一万年阶级斗争，以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¹³ 这样一来，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就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相并列，成为中国头号敌人。不断恶化的中苏关系“促进和发展了一种以‘和苏修对着干’为特征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扼杀了任何敢于提出怀疑和否定意见的创造性的批判思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毛泽东的这段语录被绝对化，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思维定式。任何人稍有不同观点的表示，哪怕是十分合理的意见，也会

11 《周恩来总理在苏联大使馆举行的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十年的招待会上的讲话》（1955.2.14），载《新华月报》，1955 年第 3 期。

12 [美]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著：《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依据》，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中文版，第 316 页。

13 参见席宣等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央党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0—56 页。

被视为异端，遭到歧视、批判和打击，甚至被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遭到残酷折磨。这种状况只能鼓励盲从而扼杀独立思考，使整个民族在错误的指引下陷入灾难的深渊”¹⁴。甚至可以这样讲，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内政外交的许多重大事件，比如反右运动、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三线建设、“文化大革命”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与中苏关系的走向联在一起的。

综上所述，跌宕起伏的中苏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头30年社会曲折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了解中苏关系，也就不可能很好地认识新中国的头30年，更不可能正确估价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

二

这40多年的中苏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完全有理由这样说，在中外关系方面，中国与任何一个国家的关系都不像中苏关系有那样多的内涵、那样多的层次。实际上，这个时期的中苏关系是集国家关系、党际关系和领导人之间的个人交往于一体，牵扯到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相同的意识形态、一样的社会制度本应使中苏两党、两国建立并且维系更加亲密、更加持久的友谊，却不料增添了许多不应有的麻烦。所以，中苏关系更像一个加了密的软件，需要人们慢慢地、细致地去解读。也正是由于如此复杂，中苏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政治界和外交界研究和关注的重点。

中国大陆以外对中苏关系的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主要出自西方（美、英、德等国）、苏联（俄罗斯）和中国台湾地区。

西方国家对中苏关系的研究除了散见于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苏联史、当代世界史、国际关系史方面的著作和大量的学术论文中之外，还见于出版的许多有关中苏关系方面的著作中。¹⁵就著作而言，大体可以分为按时间写的通史和按

¹⁴ 席宣等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央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¹⁵ 此处列出的书目，绝大多数是作者自己查到并将书全部复印下来的，但有少部分引自美国学者R. 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等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

事件写的专史两大类。¹⁶

在通史方面的代表著作主要有：迪特·海茵茨希的《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桑特·巴巴拉的《中苏冲突》，威廉·E.格里菲斯的《1945—1950年的中苏关系》、《1964—1965年的中苏关系》，彼得·迈耶的《斯大林去世以来的中苏关系》，唐纳德·S.扎果里亚的《中苏冲突：1956—1961》，克劳斯·梅内尔特的《北京和莫斯科》，R.K.I.奎斯特的《中苏关系简史》，卡尔·G.雅各布森的《毛以后的中苏关系：毛主席的遗产》，G.塞格尔的《毛以后的中苏关系》，彼得·琼斯和西安·凯维尔的《1949—1985年的中苏关系》，托马斯·G.哈特的《中苏关系：对其正常化前景的考察》，L.迪特默的《中苏关系正常化及其国际影响》等。

在专史方面还可以进一步分成几个专题：

一是中苏边界与军事关系，主要代表著作有：丹尼斯·J.杜林的《中苏冲突中的领土要求》，乔治·金斯伯格斯的《1949—1964年中苏领土争端》，雷蒙德·L.加尔特霍夫的《中苏军事关系》，哈里·格尔曼的《苏联在远东的军事集结和反华冒险》，诺顿·H.哈尔派林的《中苏关系与裁军》，瓦尔特·C.克莱门斯的《军备竞赛与中苏关系》。

二是中苏矛盾与冲突，主要代表著作有：威廉·E.格里菲斯的《中苏冲突：文件与分析》、《中苏的分裂》，吉奥弗雷·哈德森的《中苏争论：文件与分析》，里查德·维希的《中苏危机政治学：对政治变化和交往的考察》，克劳丁·门嫩斯的《中苏冲突中的苏联的观点》，G.F.赫鲁森等人的《中苏争端》，威姆拉·萨兰的《中苏分裂》，哈罗德·C.辛顿的《中苏对抗》，乔纳森·D.波拉克的《中苏竞争和中国安全争论》，赫伯特·J.埃利森的《中苏冲突》，库特·伦敦的《结盟与冲突》，赫伯特·J.艾利森的《中苏冲突：全球性的考察》，约翰·吉丁斯的《对中苏争论的考察：最近争论的评论与文选》，杰西卡·布朗的《中苏冲突》，戴维·弗洛伊德的《毛对赫鲁晓夫主义》，阿尔弗莱德·D.洛乌的《毛泽东以来的中苏矛盾：争论、缓和与冲突》。

16 L. 迪特默认为，西方学者对中苏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 50—60 年代的著述，主要探讨中苏争论的起源；另一部分是 70—80 年代的著述，主要探讨中苏争论的动因。参见 Lowell Dittmer, *Sino-Soviet Normalization and Its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 1945—1990*,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2, pp.5—9。

三是中苏关系与第三世界，主要代表著作有：阿尔文·Z.鲁宾斯坦的《苏联和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赫门·瑞的《中苏在印度问题上的冲突——1949年以来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在印度问题上冲突的原因分析》，罗格尔·皮尔森的《中苏对非洲的干预》，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的《中苏在非洲的竞争》，劳伦斯·普拉特的《北越与中苏的紧张关系》，罗伯特·A.鲁彭的《越南与中苏争端》，道格拉斯·T.斯图加特的《中国、苏联和西方》，查尔斯·麦克吉格尔的《中越关系与苏联》，威廉·格里菲斯的《阿尔巴尼亚与中苏分裂》，罗伯特·R.西蒙斯的《紧张的联盟：北京、平壤、莫斯科和朝鲜内战的政策》，戴维·高的《中苏在印度尼西亚的冲突》，托马斯·E.斯托尔泊的《中国、台湾和海岛：对外蒙古和中苏关系的影响》。

四是中苏美三大国关系，主要代表著作有：肯尼思·G.利伯撒尔的《70年代的中苏冲突：演变及其对战略三角的影响》，帕萨·S.高什的《1949—1959年中苏关系：美国的看法和政治反应》，戴维·A.迈耶斯的《击碎柱石——美国反对中苏联盟的政策，1949—1955年》，乔纳森·D.波拉克的《中苏冲突和美国安全考虑》。

另外，其他国家的学者也写有中苏关系方面的著作，如韩国学者著的《俄国对抗中国，下一步是什么？》，《中苏关系（1972—1988）：美国精英对中国的看法和政策》，《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平壤》，《中苏争论与北朝鲜》，《北朝鲜卷入中苏争论（1958—1975）》，《中苏领土争端》等；日本学者著的《中苏关于日本共产党的争论（1961—1968）》，《高岗事件与中苏关系》，《从兵要地志看中苏战争》，《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等；印度学者著的《作为1975—1984年间中苏冲突的一个因素的柬埔寨》等等。

总的看来，西方学者对中苏关系的研究还是比较全面和比较细致的，因而出的成果也比较多。然而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其中一些学者是站在反共、反苏和反华的立场上，因此在对事件的描述和评判方面特别突出其负面效应，特别强调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及其根源。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们的研究成果的科学性。

作为当事国的一方，苏联无疑十分重视对中苏关系的研究。就专门的著作而言，比较重要的有：E.卡巴列夫著的《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M.卡比恰¹⁷

¹⁷ 即贾丕才，在有些著作中还被译成卡皮查、卡比察等。

著的《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米·约·斯拉德图夫斯基著的《苏联同中国经济关系概论》，《苏中关系：1917—1957（文件集）》，米·安·苏斯洛夫著的《苏共为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O.伊万诺夫著的《苏中关系的一些事实》，米·A.克洛奇科著的《在红色中国的苏联科学家》，O.M.拉马年科著的《毛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实质》，米·斯·卡皮查著的《左得不顾理智——论毛主义的对外政策》，奥·鲍里索夫著的《苏联和南满革命根据地》，奥·鲍·鲍里索夫和鲍·特·科洛斯科夫合著的《苏中关系 1945—1980》，普罗霍罗夫著的《关于中苏边界问题》，伊·格·洛博达的《莫斯科——北京：下一步是什么？》，勃·T.库里克的《苏中分裂：原因与后果》，尤·米·加列诺维奇的《两大领袖：斯大林与毛泽东》、《两个一把手：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两大元帅：斯大林与蒋介石》、《勃列日涅夫与毛泽东、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与中国》、《1917—1991 年苏中关系中的“空白点”和“痛处”》、《莫斯科—北京、莫斯科—台北：新的起点》、《20 世纪俄罗斯与中国的边界》，A.M.多列夫斯基的《斯大林与中国》等等。在这些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也是最能反映出苏联观点的是《苏中关系 1945—1980》。关于该书和该书的作者，1982 年中文版的出版说明这样写道，“本书的主要作者奥·鲍·鲍里索夫是苏共中央联络部第一副部长和中国问题专家奥·鲍·拉赫马宁的化名，亦即人们熟知的所谓苏中问题专家、反华干将罗满宁。他与鲍·特·科洛斯科夫合写的这部著作集中了苏联当局对苏中两党、两国关系和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的基本观点。作者从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立场出发，把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的责任全部推卸在中国党和政府身上，对我国的内外政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恣意歪曲；篡改历史，捏造事实，攻击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本书出版之后一直是苏联官方和学术界经常援引的权威性反华专著。1975 年美国根据原著第一版出版了英译本；西方把本书视为研究苏中关系的‘难得的文献’。1980 年苏联又出版了增订第三版。无论在苏联还是在国际上，这部著作都有很大影响。由于这一特点，本书无疑对我国外交、宣传、学术研究等有关方面也有重要参考价值。”¹⁸ 这种评价和鲍里索夫的著作一样，都反映出中苏关系具有很浓厚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色彩。

18 [苏]奥·鲍·鲍里索夫等著：《苏中关系 1945—198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2 年中文版。

另外，近些年来，苏联时期一些曾在华工作过的外交官撰写的回忆录也陆续出版，其中有齐赫文斯基的《我的一生与中国的 30—90 年代》，贾丕才的《在不同的地平线上：外交官回忆录》，费德林的《我所接触过的中苏领导人》，奥·特罗扬诺夫斯基的《跨越时空——苏联驻华大使回忆录》，A.A.勃列日涅夫的《中国——通向睦邻的艰难之路：回忆与思考》等等。

主要是出于政治上反共的需要，台湾也有大量的关于中苏关系方面的著述。不过，台湾杂志上发表的有关中苏关系方面的文章带有很强的情报性质，¹⁹事实上许多作者就是台湾的军情人员。若抛开政治倾向和特点不论，台湾有关文献所涉及的问题却也是中苏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台湾出版的中苏关系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许昌武的《赫毛理论斗争之研究》，彭士谔的《匪俄关系的演变》，章孝严的《“珍宝岛事件”及匪俄关系》，张少书的《敌乎？友乎？美国分化中苏联盟内幕》，王聿均的《中苏外交的序幕》。需要指出的是，80 年代以前台湾地区出版的著作或者发表的文章及其作者对中共和苏联是持敌视态度的，这从书名上就可以看出，因此没有也不可能对中苏关系作真正科学、客观的研究和论述。但是，这种情况在 80 年代以后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而大有改变，如伊庆耀的《中苏关系：回顾与展望》，潘锡堂的《中共“十二大”后对苏联外交政策——“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对苏联运用之研究》等等。

三

中国内地无疑更为重视对中苏关系的研究。然而，历史地看，中苏关系在中国更多的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往往服从于政治上的需要，甚至就是当时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就像大起大落的中苏关系一样，对它的研究也是热一阵冷一阵。当时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时期，所有的文章著述都充满赞美和颂扬之词；当中苏关系处于“离异”状态时，所有的文章著述又都用尽谴责和攻击之语。总之，纯学术意义上的著述并不多，以至于评述中苏关系史研究的文章不得不将评述的重点放在 1917 年至

¹⁹ 这些文章主要刊登在台湾出版的《匪情月报》、《共党问题研究》、《中共研究》、《中国大陆研究》、《苏俄问题研究》、《中国大陆》等杂志上。

1949年这一段。²⁰ 这种状况直到90年代以后才有比较大的改观。

综观近半个世纪中国内地对中苏关系的研究，从出版物上看，明显地分为三个阶段。下面用已经出版的有关著述来说明各个阶段的特点。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50年代是第一阶段，特点就是高度赞美中苏关系。这时期出版的著作有三类：一是各地中苏友好协会编辑的，数量最多，如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编的《中苏大事日志》、《中苏友好空前发展的一年》，上海中苏友好协会编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协定学习资料》，重庆中苏友好协会编的《苏联经验硬是好》，上海中苏友好协会编的《苏联对我国工业化的援助》等等；另一类是出版社编辑的文集，如新华时事丛刊社编的《中苏关系史料》，人民出版社编的《中苏团结万古长青》，50年代出版社出版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人民出版社编印的《中苏友好文献》，新华时事丛刊社编的《中苏友好新条约》，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的《中苏两国站在保卫和平的最前线》，东北人民出版社编辑的《苏联专家在东北》、《斯大林派来帮助我们的人》，新华通讯社编辑部编的《拥护苏联，学习苏联》，劳动出版社编审部编的《中苏友好合作万岁》，《工人日报》文艺组编辑的《苏联专家到了我们工厂》等；第三类是个人写的书，如彭明著的《中苏人民友谊简史》，郭沫若著的《中苏文化之交流》，方堃著的《中苏友好史》，廖盖隆著的《中苏友好一年来的成就》，王火编的《苏联专家在中国》，海父编著的《为什么一边倒》，廉风编著的《苏联怎样帮助中国》，凝远编著的《苏联怎样帮助中国建设》，汪敏之编著的《中苏同盟无敌天下》，廖经天著的《中苏友好讲话》，星火等编著的《中苏友谊史话》，杨英杰著的《苏联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援助》，胡明俊著的《我们的良师益友》，黄陈明等编著的《从中苏合作看中苏人民伟大友谊》等。

60—70年代是第二阶段，特点是以批评和批判苏共和苏联为主。这时期中苏关系方面的文献几乎都是政治性的，其中绝大多数是以单行本方式出版的中共中央的重要文章或这些文章的汇集，主要有：《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来往的七封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南

20 参见李嘉谷：《中苏关系史研究述评》，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7期。

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苏共领导是宣言和声明的背叛者》、《驳苏共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把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评莫斯科三月会议》、《驳斥现代修正主义论文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和有关文件》等等。另外有少数由研究者撰写的著作，如复旦大学历史系编写组编写的《沙俄侵华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的《沙俄侵华史》、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沙皇俄国扩张史》、《苏修的谎言和历史的真相》（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沙皇的丑恶面目》，柯雄著的《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纪实》，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苏联》、《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樊肖等著的《苏修超级大国的帽子是摘不掉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看，今天的苏联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等等。单从书名上看，这些著作都带有非常明显的时效性和非常强烈的政治性。

80年代以后是第三阶段，特点是逐渐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开始转向学术性。与前一阶段不同，这时期的有关文献不再只是中共中央的声音，而是出自学者之手，因而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淡化，相应的学术性越来越强。²¹ 不过，从内容和写作方式上看，这一时期关于中苏关系的文献也不尽相同，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学术著作，主要有林军的《中苏关系（1689—1989）》，胡礼忠等人的《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中俄中苏关系 300 年》，沈志华的《朝鲜战争揭秘》、《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同盟到朝鲜战争研究》、《中苏结盟的经济背景 1948—1953》，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崔建华的《七十年代中苏边界争端》（英文），张树德的《蜜月的结束——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决裂前后》，王琦的《二战后中苏（中俄）关系的演变与发展》，蒲国良的《走向冰点——中苏大论战与 1956—1965 年的中苏关系》，夏林根编的《中苏关

21 参见牛军：《近十年来中苏关系研究的新进展》，载《中共党史资料》，1993 年第 1 期。不过，从内容上看，本文概括得并不完全，没有提及许多这一时期发表或出版的著述。